

聚焦长征

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

- ☆第五次反“围剿”大战在即，临时中央的连连失策，使红军从一开始就在被动局面
- ☆中共中央投石问路，先后投下了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两着棋子
- ☆湘江之战，部队损失过半。何去何从？全军将士忧心忡忡
- ☆毛泽东说：“土城不能再打了，必须立即撤出战斗！”
- ☆刘伯承嘱咐部队：“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 ☆徐向前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 ☆红二、六军团千方百计打听中央的消息，电报却转到了张国焘那里。阴差阳错，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走到了一起

主编
作者

胡锦昌 赵焱森 叶健君
刘华清

★主 编 胡锦昌 赵焱森 叶健君
★作 者 刘华清

聚焦长征

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聚焦长征——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 / 作者 刘华清.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9
(聚焦长征 / 胡锦昌, 赵焱森, 叶健君主编)

ISBN 7-5438-4514-8

I . 长... II . 刘... III. 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
1936) —史料 ②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战略—研究 IV. ①
K264.406 ② 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3684 号

聚焦长征——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

主 编: 胡锦昌 赵焱森 叶健君

作 者: 刘华清

责任编辑: 李雄伟 章红立 夏新军

装帧设计: 

成就 + 付宇

出 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邮 编: 410005

制 作: 湖南潇湘出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 话: 0731-2229693 2229692

印 刷: 湖南望城湘江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30 × 96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42,000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 7-5438-4514-8/K · 762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一 江西突围——实施战略转移的决策

1. 第五次反“围剿”大战在即，临时中央的连连失策，使红军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局面………	1
2. 广昌成为李德的滑铁卢。在严重的军事挫折面前，中共中央产生了突围的念头………	7
3. 为吸引和调动“围剿”中央苏区之敌，中共中央先后投下了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两着棋子………	12
4. 一个战略转移的决策在中央高层悄然形成，一篇署名文章透露出些许信息………	19
5. 突围部队进入指定地点。为了保密，军委给每个单位都取了代号………	25
6. “你喂的鸽子飞了。”一份秘密协议让中央红军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	29

二 通道转兵——端正战略转移方向的决策

- | | |
|--|----|
| 1. 湘江之战，部队损失过半。何去何从，全军将士忧心忡忡..... | 34 |
| 2. 蒋介石布下大口袋。毛泽东提出会合计划，一个改变战略转移方向的决策在通道县城作出 | 39 |
| 3. 红军一路争吵着到了黎平。政治局会议形成《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 45 |
| 4. 中央再度否定了博古、李德的意见。红军转变战略方向的决策终于实现 | 51 |

三 遵义聚首——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决策

- | | |
|--|----|
| 1. 在中央纵队里，他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毛泽东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 59 |
| 2.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何在？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雪白血红。王稼祥的发言很干脆：由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 66 |
| 3. 休会期间，双方都在寻求支持者。李德埋怨：“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了毛泽东。 | 74 |
| 4. 听到会议精神，全体指战员热情高涨，他们说：“只要毛主席亲自领导，我们就一定能胜利！” | 79 |

四 赤水调敌——摆脱十万敌军围堵的决策

- | | |
|--|----|
| 1. 毛泽东说：“土城不能再打了，必须立即撤出战斗！”
朱德颁布一渡赤水命令..... | 84 |
|--|----|

2. “敌变我变”，毛泽东说，“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军委决定二渡赤水.....	89
3. 蒋介石勉励部属：“剿匪成功，在此一举。”毛泽东提着马灯，夜半敲开周恩来的房门.....	98

五 凉山结盟——争取少数民族头领的决策

1. 红军先遣队进入彝区时，树林中有成群结队的彝人出没，并用喊叫声阻止红军前进.....	108
2. 刘伯承嘱咐部队：“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112
3. 彝海边，刘伯承与小叶丹饮血拜盟。小叶丹忙了七天七夜，才将红军安全送出彝民区.....	117

六 草地脱险——挑战人间极限的决策

1. “敌人判断我们不敢冒险横跨草地”，毛泽东说，“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122
2. 朱德命令部队：“我们要坚决克服困难，打掉草地这只拦路虎。”	126
3. 被称为“鸟儿也飞不过去”的草地天险，终于被红军征服	130
4. 蒋介石闻讯红军穿越草地、胜利北进之后，长声哀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142

七 先行北上——粉碎张国焘阴谋的决策

1. 在巴西，右路军一边休整，一边等待左路军的到来，却迟迟不见左路军的动静 145
2. 张国焘向陈昌浩发出密电，要右路军南下；为了尽快脱险，中央决定红五方面军先行北上 155
3. 张国焘攻击中央“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中共中央在俄界讨论张国焘的问题 167

八 陕北安家——确定长征落脚点的决策

1. 北上红军从国民党的旧报纸中获得了刘志丹部队的消息，于是决定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 175
2. 看到吴起镇街上的标语，大家不约而同地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 181
3. 与陕北红军会合，陕甘支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告全体指战员书” 186
4. 毛泽东紧紧握着刘志丹的手说：“感谢你们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一个落脚点。” 193

九 甘南握手——实现三大主力会师的决策

1. 对张国焘的南下行动，红军将士百思不得其解。朱德、刘伯承向张国焘发出警告 199
2.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不断受挫，广大将士开始对张国焘的方针表示怀疑。战士们私下议论：“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206

3. 就在中央为张国焘问题发愁时，一位国际来客突然到了瓦窑堡。为克服分裂危机，中央和林育英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	213
4. 红二、六军团千方百计打听中央的消息，电报却转到了张国焘那里。阴差阳错，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走到了一起………	222
5. 张国焘本想请一个帮手，没想到请来的却是自己的“克星”。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促成双方和好………	230
6. 联欢会上，红四方面军拿出了事先准备的讲话提纲。 贺龙激动地说：“多年来盼望见到中央红军，今天终于实现了……”	235
 主要参考书目………	243
后记………	245

一 江 西 突 围

——实施战略转移的决策

此次赤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赤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赤军新兵将近十万人……兵工厂、被服厂等各有数千工人，日夜作工，状极忙碌。以后，九月间在《红色中华》报（赤区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微露赤军有抛弃江西而到赤区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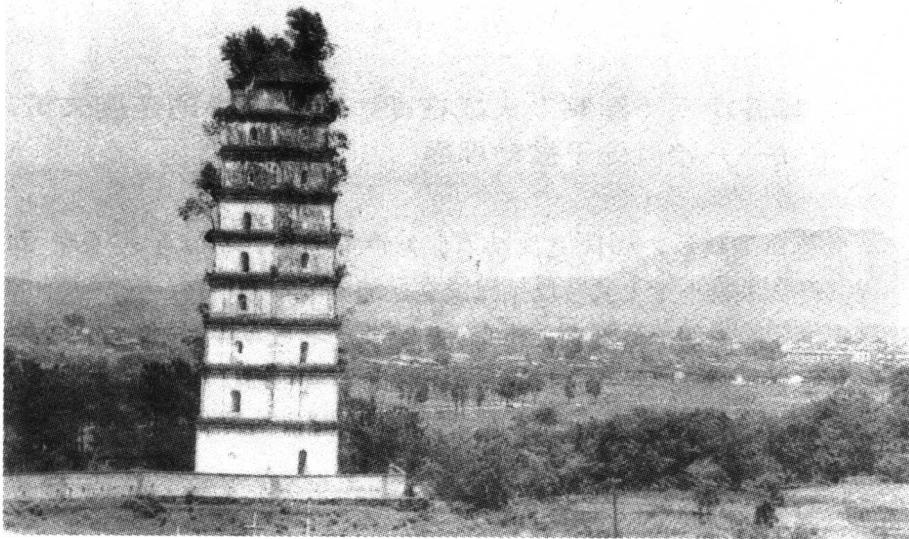
1. 第五次反“围剿”大战在即，临时中央的连连失策，使红军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局面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举起了屠刀。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道路，在广大农村地区点燃了熊熊的革命烈火，建立了一支支工农红军和一块块革命根据地。为了扑灭蓬勃发展的革命烈火，蒋介石从1930年底开始，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但都被英勇的工农红军所粉碎。

这时，蒋介石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并一步步逼近关内的事于不顾，决心对工农红军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为了取得此次“围剿”的成功，蒋介石作了多方面的准备。1933年5月，在南昌设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要务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亲自坐镇南昌，指挥这次“围剿”。在政治上，

聚 焦 长 征

继续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在经济上，控制交通，实行贸易禁运，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他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不断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最后将红军压缩在狭小的区域内，“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还聘请了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作顾问，拟订作战计划；用美国、英国的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部队的新式装备。6月，蒋介石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7月至9月，在庐山举办了三期军官训练团，受训者达7500多人。经过半年的准备，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自任总司令，疯狂向革命根据地扑来。当时，在几块大的革命根据地当中，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已受到很大损失，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主力红四方面军已经西迁，在川陕边界地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主力红二军团，已缩编为红三军，在湘鄂川边界流动游击。只有中央革命根据地损失不大。因此，蒋介石这次将“围剿”的重点放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瑞金

为了消灭中央红军，蒋介石集中了50万兵力，分编为北路、南路、西路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其具体部署是：北路军以

顾祝同为总指挥，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下辖三路军，共33个师又3个旅，向广昌方向稳步推进，寻求与中央红军主力作战。是此次“围剿”的主力。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前敌总指挥，下辖11个师又一个旅，阻止中央红军向南发展，并逐步向筠门岭、会昌地区推进，协同北路军作战。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阻止中央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此外，还有十九路军等部6个师又2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中央红军向东发展。

这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已发展到8万多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有一定发展。尽管形势严峻，但红军如果能正确估计形势，针对敌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敌人的“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

可是，临时中央的错误指挥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宝贵机会。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反“围剿”斗争由临时中央直接指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由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聚焦 焦 长 征



李德

政策，在上海无法立足而被迫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又把“左”倾冒险主义政策运用于反“围剿”斗争之中。在蒋介石正大力准备“围剿”的时候，1933年6月1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临时中央关于今后作战的指示，提出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即将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与赣江之间积极活动，破坏敌之作战计划，一部分组成东方军，进入福建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7月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以红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前者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后者以林彪为司令员，聂荣臻兼政委。这种分散兵力的错误做法，使红军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局面。结果，中央军几乎无仗可打，被置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东方军则连续作战，造成部队非常疲劳。红军由此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这年9月底，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李德（1900—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到中国后化名李德。他原是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属于德国统治的奥匈帝国，他参加德军同沙皇俄国作战。1920年因参加德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后来越狱秘密逃往苏联，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过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毕业后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据李德自己回忆，他到东方的使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李德虽然是军事科班出身，但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会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但是，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却对他十分信赖和支持，把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他。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临时中央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驻地沙洲坝附近给他建了一所独立的房子，中央红军的许多命令、指示就是从“独立房子”发出的。后来，

二 长 征 中 的 重 大 战 略 决 策

为进一步集中军权，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直接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指挥作战。调整后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仍以朱德为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但实际指挥权却把持在博古、李德手中。当时给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回忆说：

李德在担任我党军事顾问时，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当时适逢王明‘左’倾路线发展到顶峰，李德同他们倒是气味相投，配合得非常默契。那时李德就是同博古谈得来，他们谈话不用翻译，我们在另一屋听得很清楚，两人有说有笑，亲热得很。博古当时是临时中央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总书记的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正如中国古代成语所说的，‘相得益彰’。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他们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指挥权，排斥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由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由李德一人呆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

让这样一个人来指挥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岂能不给中国革命

聚焦长证

造成严重损害？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的3个师首先向黎川发动进攻。黎川位于闽赣边界地区，是闽赣省府所在地，东连光泽、邵武，南接建宁、泰宁，西通南丰、南城，北达金溪、资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闽赣军区主力正在福建和十九路军激战，守卫黎川的红军只有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部队，总共才几百人。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在战前曾建议，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翼打击进犯之敌，而不应死守黎川。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临时中央的批准。不得已，肖劲光只好将自己的少量部队撤出城外。9月28日，黎川失守。黎川丢失，使红军东方军和中央军的联系被切断，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为此，博古、李德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令红军北上迎敌。于是，1933年10月初，彭德怀率红三、五军团由福建泰宁奔袭黎川；林彪、聂荣臻率一军团至南丰，牵制蒋军行动。红三军团在河口打败吴奇伟3个团，随后在李德的强令下进攻硝石，企图重新夺回黎川，结果接连失利，损失巨大，致使第五次反“围剿”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状态。

这时，红军还失去了一次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正当红军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1933年11月20日，在福建发生了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反戈一击的“福建事变”。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以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黄琪翔等，宣布成立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在此前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代表还先后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和《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约定相互停止军事行动，确定边界，并恢复交通贸易关系。中共临时中央如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将是十分有利的。为应付事变，蒋介石暂时停止在江西的进攻，从顾祝同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组成第二路军，由蒋鼎文率领进入福建。同时，又组织了张治中的第四路军和卫立煌的第五路军，协同作战。针对这一有利形势，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等纷纷向临时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和主张：周恩来提出红三、五军团应侧击蒋介石的入闽部队；张闻天认为

应在军事上与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毛泽东则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但这些正确意见都没有被临时中央所采纳。博古等继续把中间派看作“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在军事上给予第十九路军的反蒋斗争以直接有力的配合。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打击和分化下于1934年1月彻底失败。临时中央的错误决策使红军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丧失了借助这一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最有利的战机。对此，朱德在自传中回忆说：

当蔡廷锴暴动的时候，应该用全力去打击闽浙赣边。敌如果一来，就会陷死在里面，有进无出，饿也会饿死。当时在闽浙赣边的中央军相当空虚，他们又焦急，如果打去，可以消灭他几个师，而且牵制了敌人，可以使福建至少能支持半年。结果只以一个七军团去打，力量少小，当然没有牵制得着。李德当了军委会顾问，一切我们都无法反对他。我们当那时，却想休息疲乏，就没有进行。就是同十九路军挨近打也好些。就是失败了，也不会让十九路军缴了枪。在五次反‘围剿’中最大的关键就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

2. 广昌成为李德的滑铁卢。在严重的军事挫折面前，中共中央产生了突围的念头

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之后，重新调整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剿”部署：以入闽“讨伐”十九路军的主力为基础，编为“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以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陈济棠为南路军前敌总司令，余汉谋为前敌总指挥。仍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战术，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逐步推进。蒋介石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剿灭中央红军，据3月25日天津《大公报》报道：

“顷由南昌来京之某军事长官谈，赣闽边境赤匪盘踞已久，蒋委员长下最大决心，期于三个月将其彻底肃清。”

面对敌人的战略调整，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

聚

焦

长

征

击”战术。4月，他以华夫为笔名，接连在中革军委创办的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第二、第三期上发表了《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两篇文章，专门论述了“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新战术的原则及其实施办法，作者写道：

在当前的条件下，新的战术主要是从下列三个准则出发的：

1. 为了开展游击战争，应派出小股战斗部队牵制、削弱和分割敌人力量，与在敌人背后、侧翼以及正面活动的地方部队协同动作。要完成这个重要任务，他们一定要有人民的支援，同时也一定要在各种战斗中表现出独立和主动的精神，灵活和勇敢的精神。在开展游击行动时，这些部队还应负有破坏公路、破坏敌人工兵设施和堡垒，以及封锁开阔地敌人的任务。

2. 在敌人主攻方向应建立防御体系，以此来直接保卫苏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弹药）牵制住敌人最大的兵力。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在山区只应进行灵活的防御战。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我军的特点，尤其是红军善于英勇作战的能力。每次防御时，应组织积极防御。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数量的人力和火炮，当敌人在我阵地前沿出现时，应以埋伏之主力部队，利用短促突击和奇袭的办法，加以驱散和消灭。消极防御，必然导致失败。

3. 因此，主力应集中于一定方面，这样才能给予在阵地以外的敌人以坚决的突然的打击，并消灭其有生力量。虽然游击战和防御战在革命战争的战斗中是不可缺少的，但只是战斗的辅助形式，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主力的运动战和袭击战。只有这样，红军才能赢得第五次“惩罚性征讨”中以及今后“围剿”中的胜利，红军才有可能转向战略进攻。

当然，在其间还应变化战术战斗方法。一般说来，敌人离开堡垒不会超过10~20里（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更短）。把敌人诱入我们的领地，现在通常已不能成功。要想抓住敌人，自己必须隐蔽起来，一旦敌人向前移动，就给予致命的一击。最有效的办法是从侧翼向敌人后卫发动进攻，当然也可以向敌人前卫发动突然袭击，但必须切断敌人与出发地的联系，这样才能有把握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缴

一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

获敌人的武器和器材。一进入战斗，就必须立即投入所有人力和物力，尽快地、一下子就决定战斗的结局。

李德这种“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战术理论，实际上就是让红军舍弃自己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而去同敌人拼消耗，这种战术对于兵力和武器装备均处于绝对劣势及战略防御地位的红军来说是灾难性的。

广昌便是李德军事理论的滑铁卢。



《红色中华》关于广昌失守的报道

广昌位于盱江西岸，在黎川之南，宁都之北，县城坐落在群山之中，是中央苏区北部的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军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集中11个师的兵力，由陈诚统一指挥，首先向广昌发起了进攻。毛泽东、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对他们的意见不予采纳。在博古和李德眼中，广昌是万万不能丢的。他们知道，广

十二日一二十六日）在河丙由朱生福等率軍擊退，沙溪坡，在河東九龍岩，高州城一帶被焚毀，逼歸向甘竹（河西），大羅山（河西）清潔隊被燒毀，溫寧關裏向廣昌還未的陣地；我軍在敵人直撲成片廣昌城的威脅形勢之下，為保廣昌，遂即進到陣地戰，在廣昌城外的陣地上，與敵軍堅決戰，阻止敵軍前進。廿七日晚河丙敵軍繼續圍攻四個關山（是生福向敵軍報告，河丙前鋒周繼慶率一師以上兵力向我北進由一帶陣地進攻。我軍與敵軍戰慄，欲撤尚未得手。當日夜仍繼續相持，廿八日敵陸續增援，在飛機大炮掩護之下，猛烈進攻。我軍勇與敵抗戰竟日，終因糧馬不利，退出廣昌，敵軍十四，六十七，九十八三個營要還佔廣昌城，於二十九日開始在廣昌附近新入坪及宮州場以南拆築工事，似有長保的企圖。

記者按：廣昌是我中央蘇區北方的大門，我軍則軍在廣昌過冬的武裝工人，赤少隊，及其他的新式武装精銳參戰和後勤之下，為保廣昌，同敵人血戰了半月，得以敵人擊潰潰敗與飛機大炮的掩護，僥幸主力十餘師（這是蒋介石所調主力軍），空襲式的進攻，只能與敵以相當的抵抗而暫時退出廣昌。這一空襲被警報告訴我們：必須以更加堅強的精神，更堅強的湖水般的湯人紅軍，加入赤少隊，那入游擊隊，更廣泛的參軍參軍參軍等，更積極的參戰與配合红军作戰；要在黨和政府和五月份動員的號召之下，奪回廣昌，擊破敵人各個戰線的進攻，“不讓敵人侵入幾尺寸土”，以保衛中央蘇區，粉碎敵人的圍攻。